专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文化强国需“造血” 民族之“根”要保护

如何深刻认识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的内涵和意义？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表示，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造血”，造一个新鲜的血液，给我们这个民族增添新的力量。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强国的建设不是简单完成文化传承的问题，要把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

中央三次六中全会议题之变折射发展新思路

李君如表示，十七届六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是高高举起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二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同时也制定了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前，党中央曾经开过两次全会来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第一次是十二届六中全会，当时解决的重点问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仅仅抓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包不包括思想道德建设，这是当时召开中央全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是在十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我们经历了一个苏东剧变，同时又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所以，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1)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十七届六中全会是中央第三次研究精神文明问题，这次是讲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讲的“文化建设”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讲的“精神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来说的，而文化建设是相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而言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研究文化体制和文化建设问题，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样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形成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国。所以，中央每一次研究文化问题，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就是亮点。

保护中华民族之“根” 勿简单传承

如何正确把握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李君如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使命感、责任心。今天，中央强调加强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因为我们面临着精神生活如何健康发展的紧迫课题。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的改善了。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除了要有比较丰厚的物质文明条件之外，更要有比较健康的精神文明的条件。我们有的人钱包是鼓了，但是脑袋是贫乏了。所以，六中全会重申了一句话：“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李君如说，精神生活的问题联系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就更为严峻。因为中国现在是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中心舞台，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要让世人看到中国人是对资源、生态具有保护、对人具有爱心的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责任心、是否爱好和平，不仅关系着社会和谐，而且也关系着国际形象。

所以，李君如表示，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必须具有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心，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加强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在成为世界大国之际，需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上来。

李君如指出，“小悦悦事件”体现出社会的冷漠和精神的贫乏，之所以会那么引人关注，因为许多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把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伦理传统丢掉了。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根”在悄悄地腐蚀了。而这个“根”的腐蚀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没有人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民族能不能够保持自己优良传统的问题。

所以，不仅广东应该“拒绝冷漠”，全国各地都应该“拒绝冷漠”。“拒绝冷漠”是为了保护好我们这个民族的“根”，让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以一种讲道德、有爱心的优秀民族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因此，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加强文化建设，不是一个简单完成文化传承的任务，而是要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要把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高高举起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李君如说。

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精心“造血”

李君如表示，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以下战略意义：

第一，建设文化强国，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一个民族国家若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绝对不是一个强国。因此，要建设成一个强国，不仅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还要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社会活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一个多元的社会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利益上，而且表现在思想上。所以，中国13亿人的思想文化出现了多样性、选择性、多变性等一系列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课题。所以，要建设文化强国，首先就是要通过文化来整合整个社会，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建设文化强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新阶段有许多难关需要我们去攻克，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去化解。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智力的支持。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用文化来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因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可以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全面实现我们的现代化目标。

第三，建设文化强国，是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一种全新的形象，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人看不起。所谓的“东亚病夫”，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的物质条件差，而且指的是我们的文化素质差。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大批走向世界，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我们的国人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表现出不文明，留给世人的就是一种不佳形象。这种情况下，怎么让人看到一个大国、强国形象呢？所以，我们建设文化强国，从总体上讲也是为了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四，建设文化强国，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但是，血液是要更新的，否则就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所以，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造血”，造一个新鲜的血液，给我们这个民族增添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归根到底就表现在我们中国人思想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最大的福祉。

建设文化强国需借鉴美国文化发展经验

网友提出，为什么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其文化影响力能独霸世界，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却小得可怜。

李君如表示，美国现象始终是我们应该好好去研究的。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既没有那么多文物可以挖掘，也没有那么多文化典籍可以传承。但是，它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研究美国的文化现象，并不是要崇洋媚外，不是简单地肯定美国文化，而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文化建设有什么规律，建设文化强国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途径。在李君如看来，美国文化现象有以下几点可以供我们参考：

一、美国很重视文化的创新。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好事，但是好事背后也有一种隐患，那就是背上了文化的“包袱”，缺少文化创新的内在需求和动力。文化是我们一个民族血管里的血液，血液是要更新的，否则就意味着生命的衰退。所以，一个民族文化有没有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取决于它能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能不能创新。美国文化现象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创新。

二、美国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文化是靠人去塑造的，是要靠有创新能力的人去推动的。人才问题在文化建设中间事关全局，必须高度重视。文化人才和其他人才不一样，它不是靠那些听话、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人和事，而是靠求新求变来给社会提供崇高追求的精神力量。所以，一个国家文化要发展，首先要有一大批创新人才。

美国重视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同它具有一种多样性的包容文化环境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在文化创新过程中间，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是包容，还是拒杀，将会影响到创新人才的成长，更会影响这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所以，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的政策，我们现在提倡文化繁荣也是因为社会逐渐增加了这种包容性。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性，就不可能有创新型的人才，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繁荣。

三、美国十分重视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文化的影响力是在传播中实现的，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市场是文化传播的良好渠道。所以，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就是同它的文化传播力相联系的，而文化的传播力又同它的文化市场的发展相联系的。比如一部《阿凡达》可以十几亿的收入，就是靠市场。而市场带给美国的不仅仅是美元，而且是美国的文化影响力、美国的软实力。所以，我们这次六中全会根据这几年文化改革的经验，强调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要大量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市场化的路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来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据《人民日报》

河南应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先锋作用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的，才是永恒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创造出让世界为之惊叹的物质文明，更拥有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更能成为软实力的领导者。

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要打造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要率先垂范，积极探索，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路来。

近年来，中共中央认真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应该团结带领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贡献。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物产丰富，交通发达，人才辈出，自古即是“得中原者得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先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地，更是古今中外文明的交汇地，这里“抬脚踢秦砖，触手抚汉瓦”。翻看中国文化史，有一半以上的鸿才大儒、风流人物从这里走出，书写了无尽的中华经典文化。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多个中华姓氏的起源地，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对海外华人圈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与亲和力，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会为河南的发展增添独特的魅力与机遇。可以说，河南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华丽转身之旅必将为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提供借鉴和参考。河南，应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先锋作用，这是光荣的使命，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走创新发展的蝶变之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美国文化产业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中地位仅次于军事工业的支柱性产业，每年的产品出口超过了航天工业相关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美国是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美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总结这些经验对我国、我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产业强国，美国拥有2300多家日报、8000多家周报、1.22万种杂志、1965家电台和1440家电视台，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这三大电视巨头以及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全世界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视票房收入都在美国。每年创收数千亿美元，其经济总量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目前我国文化产品的实际支出每年仅8000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科学院有关内地文化产业的年度报告可知，按内地生产总值计算，文化产品市场的产值应达到每年4万亿元人民币。可见我们的差距和不足，同时也说明了我国、我省的文化市场前景和市场的空间之大。

美国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大国，源自其近年来的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之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就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来大力发展。美国人早早就认识到，经济效益不仅是佐证文化价值和社会效益的重要元素之一，而且更是支持和提升文化艺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以经济效益来扶植文化艺术，就必须要走产业化道路，而走这条道路就必须历经：文化艺术的产品化，文化单位和传媒机构的企业化，文化艺术领域和多媒体现代娱乐集团的资源整合，以及结合新媒体科技和现代金融体系所打造的规模化的文化产业航母。

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总署等文化主管部门也在试水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对一些非时政类的经营性出版机构和报刊社改制，进而将他们推向市场，这是难得的尝试，但距离成长为文化巨人，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跨界化发展的多元之路

美国还是最早将文化娱乐业与制造业、金融业、旅游业、文化地产、新媒体、网络动漫等相结合形成合力的国家之一，这样的跨文化、跨领域的合作就必然撞击出全新的创意和极具竞争力的生机。早在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合作的第二年，其382亿美元的销售额就足以让其傲视同群成为媒体巨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和新思维的诞生也融入了文化产业，电影3D技术的研发，令电影产生了全新的运作模式，进而带动了3D动漫、3D现场演唱会和3D体育赛事直播等一系列的新型文化产业，同时还带动了传统电视、电子游戏和手机通讯业等产业的提升。

美国文化产业在投资领域的主要特点是投资主体的多样性，形成政府、外来投资和融资体制三结合的机制。一方面国家直接向所有符合政策导向的团体提供扶持，另一方面吸收非文化部门和外来投资，一些大财团就直接向许多有实力的文化产业巨头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进行投资。美国还广泛吸收世界文化资源和各国人才，并且结合自身科技优势，使美国文化产业具备了向外扩展的有效手段。

目前，我国、我省的新闻出版行业管理还比较严格，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试点让那些早已被市场淘汰、遭读者抛弃的刊物、报纸死掉，吊销他们的刊号、报号。但整体上，对报、刊号的管理还是太僵化，那些“该死的死不掉，该活的没法活”现象还比比皆是，这直接限制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流入到新闻出版等文化产业，使大批体制外的优秀新闻出版人才英雄无用武之地，同时也让那些国有文化单位的部分员工尸位素餐、人浮于事，进而白白浪费国家资源，严重制约了我国、我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此弊端不除，我们的文化出版事业就很难获得新的解放和飞跃。

走科学化管理之路

与许多国家不同，美国政府没有设立文化部来专管文化产业。原因是美国信奉市场规律和市场竞争对文化产业所起到的调控功能。“文化产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从业人员享有表达和创作上的高度自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从而创作出杰出作品。”从这一点出发，美国政府认为，文化产业与钢铁、汽车等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没有区别，所以应为文化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个人的文化创造提供一个公平合理、充分竞争的舞台，并给受众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是唯一有权对美国媒体行使管理权的机构，但其职能仅限于给广播电台发放执照，对其广播节目的内容、编排、广告营销和运营等无权干涉。另外两个主要的国家级文化机构是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公共广播公司。这两个机构由美国国会直接拨款，任务是利用这笔拨款，发展艺术和公益性质的广播电视。

虽然没有专“管”文化的国家级机构，但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法律法规和各项优惠政策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包括对于传统经典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对于新兴创意文化项目的扶植推广。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等组织机构对文化艺术产业给予资助，很多时候都是采取政府补助一半，艺术团体自筹一半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文化艺术团体有一个好的项目建议书，加上自筹的一半经费，政府机构就有可能给予另一半的资助。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文艺界也迎来了解放，秉承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大文艺工作者热情讴歌新中国，迸发出了空前的创造热情，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更加需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需要发挥文化战线的广大文化工作者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邵培松

（作者单位：民进河南省委）

观点速递

反腐治本之道

缪青在《廉政文化研究》撰文指出，反腐治本之道在于制度推进、参与氛围和常态化反腐路径。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改革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多发期，贫富差距和遏制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反腐败作为保障分享式发展的基础环节，不仅要惩戒贪腐，而且要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和利益分享的公共秩序，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富而有礼。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看能否在既得利益、权力和人情的复杂纠葛中探寻到腐败扩散的机制，进而通过制度推进和公民参与来阻断它并进行主动防御。这便是公民文化框架下的防腐扩散机制。它包括微观结构上的资源开放、规则透明、问责制等流程，宏观秩序上基于“民治才能民有”的制度建设和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参与氛围。这种微观结构与宏观秩序的互动，将有效稳妥地解构既得利益圈子，使熟人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形成对腐败的普遍抵抗机制，从而克服古典治理的困境，冲破“历史周期率”的命运，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大力发展社区老年服务

周彩姣、陈成文、孙秀兰在《湖南社会科学》撰文指出，开展社区老年服务是缓解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能让老年人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国的社区老年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不足，所以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社会和谐为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规范和发展，尽快建立和完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首先，政府要加大对社区老年服务的财政支持。其次，政府要完善社区老年服务的法律法规。(二)建设专业化的服务人才。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人员使用机制、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有效的服务人员激励机制。(三)加强社区志愿者的管理。一方面，建立社区老年服务的志愿者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提高社区老年服务志愿者的素质。(四)促进社区老年服务与家庭养老的融合。促进社区老年服务和家庭养老的融合，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未来养老的一种基本形式。(五)促进社区老年服务与社会化的融合。

完善社会捐助工作的基本思路

蒋积伟在《科学社会主义》撰文指出，新中国的社会捐助工作经历了倡导与反对、经常化与规范化、创新与制度化三个发展阶段，逐步由一种零散被动的行为演变成一种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活动。但在制度建设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捐赠与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社会捐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捐助来源单一；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等。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捐助工作：1.重视民间组织在社会捐助中的作用。一方面，民间组织可以承担部分原本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受赠责任。另一方面，应扩大民间组织对受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权限。 2.明确社会捐助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提高社会捐赠的积极性，政府应该抛弃“慈善完全是免费”的观点，对捐赠者的税收优惠政策作出明确的界定。3.明确社会捐助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对社会捐助中出现的违法行为，政府应该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其法律责任，净化社会捐助的环境。 4.提高捐赠款物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对于捐赠款物的分配和使用情况，应由民政部门统一向社会公布，且一般每年不少于两次。集中捐赠和募捐活动一般应在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社会公布信息。

加快完善社会管理手段

叶庆丰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撰文指出，社会管理是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运用法律、法规、政策等国家政治工具，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方式主要指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管理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途径和手段。我国现行社会管理方式存在“五轻五重”：第一，在管理主体上，重政府、轻社会；第二，在管理支点上，重管制、轻服务；第三，在管理组织上，重机构、轻整合；第四，在管理方法上，重专项、轻常态；第五，在管理过程上，重要求、轻投入。为此，必须完善社会管理手段。第一，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发挥互联网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第二，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加快社会管理方面的立法进程，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和司法救助。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维护法律的权威，提高干部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